

张传玺著

翦伯赞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书 名: 翦伯赞传

责 任 者: 张传玺 著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065-7/K · 210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 100871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375 印张 507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第二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传是较详细地介绍翦伯赞一生的一本传记，许多史事过去鲜为人知，极富传奇色彩。

翦伯赞，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是一位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远祖世居今新疆地区，元朝内迁，明太祖赐姓翦氏，定居湖南。翦伯赞青年时代，曾留学美国，参加北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前、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主要在上海、南京、重庆、香港等地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并为新史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翦伯赞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旧史学，建立并发展新史学。尤其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坚决反对极左思潮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文革”中，他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后被迫害致死。1978年8月，邓小平复职，亲自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翦伯赞的十年沉冤始获彻底平反昭雪。

本传史料翔实，观点鲜明，文字流畅，对史学界、文化界、大中学校师生及社会人士等都有阅读价值。

献给翦伯赞先生
诞辰一百周年

心三試筆
 富強學友至同窗
 未暇張月輪高三面紅旗
 別家驛又是二年元旦夜佳
 歌言吻心望貴。
 今夜燈光分外明萬家歡
 慶昇平豈非空美國歡
 喜聲。
 家梅書

征管燕園年復年少年三
 不困途願在騎上驂馳馬
 同而紅中極着鞭。
 無情日月持竿或六甲夜
 是方年。東笑先生發後由
 定他振筆談神壺。

翦伯贊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會舉行的
 迎接 1964 年元旦晚會上題詩四首

我实在交不去来
走，这条路绝路

在这条绝路上，师傅完全不知道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翦伯赞在 1968 年 12 月 18 日午夜手书

绝命词全文

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开幕词

(代序)

周一良

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历史系主任、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被迫含冤而死，已经十四年了。二十年之前，他就任副校长；三十年之前，也就是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翦老担任了历史系的主任。今天，我们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开这个学术纪念会，来纪念翦伯赞同志。

翦伯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他是早期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者之一，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极少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解放前，翦老不仅研究历史，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现代历史篇章里，留下了革命的足迹。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犀利的笔锋，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历史和现状，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抨击。当时翦伯赞同志在以历史作为战斗工具，使古为今用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翦伯赞同志在主持历史系系务的十几年里，首先抓、经常抓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他对同学讲，对教师讲，既讲他学习经典著作的艰苦，又讲他学习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历史问题的甜头。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而绝不僵化；他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而随时代前进。他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轻视少数民族。但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他却从不忘记汉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不断反对以狭隘民族主义态度来研究和论述历史。他反对空头理论，看重史料的重要性，要求史料依据的确切可靠。但他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帅和指导作用，认为应当观点与材料相结合。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就是不断把观点与史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的過程。在这样实践的基础之上，翦老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他的史学思想，其成果就是《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等一系列理论性文章。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常常说的一个比喻。翦伯赞同志说，历史史料如同散在地下的一大堆古钱，你必须要有有一根绳子，才能把这些“孔方兄”串起来，而这个钱串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北大历史系十七年里毕业了大量的学生。正是由于翦老的教导，他们一般都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因而在各种不同岗位上，能够胜任工作，作出成绩。

翦伯赞同志对于教学和研究的关系，主张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1958年以后，大学里不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教材，甚至让没有学过那门课程的学生来编那门教材，一门课的教材许多学校在编写，反复在编写。他对于这种现象，是有看法的。他主张教材编好以后应当实践使用，稳定几年。在这期间，抓紧重要问题的研究，等取得研究成果以后，回过头来再修改教材。这样作，重要问题才能得到突破，学科方能得到进步，教材才能真正得到提高。1959年，在翦伯赞同志积极支持之下，历史系出版了发表师生研究成果的刊物《北大史学论丛》。他为这个刊物写了《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一文。现在回想起来，他在“大跃进”的气氛之中写这样的文章，是有其深刻含义的。在周扬同志领导的文科教材编写组

里，翦老自己主编的教材《中国史纲要》，就是在历史系同志们研究基础之上所编成的。经过翦老精心指导，刻意琢磨，直到今天，这部书还是史论结合比较好、比较受欢迎的通史教材。

我系考古专业的设立，是翦老主持系务时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院系调整前的北京大学，只有博物馆专修科。1952年，在历史系参加下，举办了考古训练班。由于建国初期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真是出现了古人所谓“地不爱宝”的现象。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地下古物不断发现，考古田野工作人才和研究人才的训练培养，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翦老积极主张在系里开办考古专业，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学里的第一个考古专业。我还记得，他当时为了给考古专业聘请教员，制定计划，城里城外到处奔走，任劳任怨，煞费苦心。今天，我系考古专业已培养出几百名毕业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岗位上，有的还担负着领导职务。考古专业之所以能为国家作出贡献，饮水思源，不能忘记翦老的功绩。

翦伯赞同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但是，作为系主任，他对于系里外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于外国史方面人才的培养，同样给予关心和重视。大学历史系里成立世界史专业，北大是最早的一家，而这又是在翦老积极倡导、热心支持推动之下实现的。五十年代末，不少学历史的留学生从东欧各国回来，翦老主张储备这些同志在系里。他认为这些同志暂时可能没有课可教，不能发挥所长，但应当让他们对所留学国家的历史深入研究，准备以后各门国别史学科的发展。同样，系里聘请外国专家所培养的人才，翦老也主张尽量保留，以推动和加强有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不幸由于历次运动的冲击，他的主张没有能实现。

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办，也是和翦伯赞同志的支持与

赞助分不开的。他不但代表历史系和金灿然同志等积极筹备规划，而且特为《光明日报》写了题为《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的文章。翦老指出，整理古典文献这个工作：第一，与厚今薄古的方针不矛盾；第二，不是没有思想性的纯技术工作；第三，它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翦老的文章既正确地宣传了这个新专业的目的性，又解除了社会上以及与这个专业有关的人们的思想顾虑，可以说是替古典文献专业起了开宗明义、鸣锣开道的作用。最近，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大力开展整理古典文献的工作，又有一些大学开办了这方面的专业。翦老二十多年以前提出的这三点，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翦老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为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文化学术界这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欢欣鼓舞！

翦伯赞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定要学习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意志，学习他坚持真理，勇于开创事业的战斗精神。我们一定要继承翦老遗志，实现他的种种设想，办好历史系，让它在祖国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

(代序)

邓广铭

解放前，我就同翦老认识了，但来往不多。解放后，而且是院系调整以后，他当了北大历史系的系主任，才经常接触。我觉得他当系主任有几件事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纪念。

第一件事：团结原清华、燕京、北大三校的历史系的教师，倡导良好的史学风气。翦老是在院系调整后任历史系的系主任的。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是由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历史系合并而成的。这三所学校，过去都是老子天下第一，没有一个不是如此，门户之见甚深，谁也不服谁。三校虽是“分久必合”，但这是很不容易合得拢的。而翦老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却非常之好。他能巧妙地将三校的历史系的教师团结起来，使他们通力合作，消除门户之见。他对待三校的人，没有厚此薄彼的偏见，这给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所以，从那时起，我很佩服翦老的领导艺术。原三校的历史系教师，在业务上都有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翦老提出，要在北大历史系树立起一种良好的学风，这是他的雄心壮志。他说，我们不要搞宗派，但搞一个学派还是应当的。他所要树立的良好学风，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的实际恰当地结合起来的学风；他所要建立的学派，就是以保持这样一种优良学风为特点的学派。对于中年以上的教师，他知道他们都

掌握了一定的史料，便劝说他们要特别重视理论的学习。他常向他们说，史料好比一堆铜钱，理论则好比穿钱用的绳索，必须运用马列主义把漫无统纪的史料贯串起来，才能使之形成系统，才能用来阐明历史问题的实质和真象。对于学生，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另一方面还劝说他们去广泛地阅读史料，要他们运用马列主义去研究这些史料。他力图使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史学界当中，首先树立起这样一种学风，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学派。他一再说，这不是搞宗派。但是，当时遇到的阻力很大，翦老这一愿望实际上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也得怪我们当时那些作教员的有些不争气吧。1961年，周扬同志领导文科的教材建设，在会上，谈到中国通史教材的编写问题。当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郭老主持下，搞了一部《中国史稿》，但它不是准备作大学的教材用的，是供一般干部阅读的。北大历史系师生结合，从1960年开始也打算编一部中国通史，可是师生之间关于社会分期问题争论很大，闹得不可开交，以致无法进行下去。到了开文科教材编选会议的时候，翦老主动提出要把编写《中国通史》教材的任务承担起来，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承担起来。他主动承当主编，而且后来他也确实起到了主编的作用。他写文章，论述司马光怎么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就是表明他要真正尽到主编的责任。翦老为了尽到主编的责任，特意躲到苏州去，在那里进行讨论、修改、定稿。在北京不行，从早到晚，整天有人找他，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其所以要编这部书（即后来出版的《中国史纲要》），就是为着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历史实际，树立一种好的学风和文风。不是引几句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作“镶边”之用，不是这样，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贯串进去。当然，我们这些执笔的，在编写

中没有真正达到翦老的要求。可是“文化大革命”一起来，把这部书当作“大毒草”，在报上公开批判时，我们所有参加编写的人也只好跟着批，并把“罪状”推到翦老一人身上，苦思苦想，找出些理由来，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翦老不许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话写进书里。有没有这个话呢？有这个话。不过，翦老是说，你们不要说马、恩、列、斯怎么论怎么说，你只要在论述历史当中贯串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行了，确实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在大字报中，宣布翦伯赞的“罪状”，这就是一条。

翦老在历史系，不但能把所有的教员团结起来，使其发挥各自所长，而且努力倡导一种好的学风。他有这种责任感，有这个责任心，要使北京大学在史学界当中，树立一种好的学风，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这是他作历史系主任所值得纪念的。三校合并，是个散摊子，各不相下，我不佩服你，你也不佩服我。用他的领导艺术，使原三校的人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翦老作系主任，不是做维持会长，而是创办事业。他是在难度很高的情况下，在“三雄”不能并立的情况下来到历史系的。在翦老的领导下，“三雄”并立了。

第二件事：不懈地宣传历史唯物论，勇敢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翦老的胸怀很广阔，他关心的不仅是北大历史系。他对于整个史学界的方向道路都很关注。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当史学界出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时，他就勇敢地站出来说话。我们党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其中重要事件之一，就是肃清极“左”思想的影响。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从极“左”思想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直到十二大，还提出要肃清极“左”的余毒。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从此都逐渐走上了正确的方向。历史

学界过去有没有极“左”思想支配，有没有极“左”思潮的余毒需要肃清？这是我们应当很好考虑的。我认为，从解放以来，忽而偏“左”，忽而偏右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每一次发生的时候，翦老总是挺身而出，写文章、作报告，奔走呼号。解放初，出现过光谈阶级观点，不谈历史主义的情况。阶级观点决定一切，在许多问题上说不通。翦老对此写了提倡历史主义的文章。后来又有一个口号叫“以论带史”。这个口号正确不正确，本来就值得研究。但是后来又发展到把带动的带变成了代替的代，成了“以论代史”，光讲理论，不讲史实。翦老对此很气愤，他说，写文章满篇都是引用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就是没有作者自己的话，那你这篇文章应当还给马克思，还给毛主席，怎么能算是你张三李四写的？翦老对这样的学风、这样的文风是非常厌恶的。因此，他到处讲话、作报告，反对“以论代史”的口号。他为此而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论代史”是一种极“左”的口号，反对这一口号，就是捍卫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路线。这说明，翦老对中国史学界树立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在当时，真正表示了自己的责任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的：一个是翦老，一个是范老，一个是周扬同志，就这三位。他们力图要纠正史学界这些歪风邪气。翦老的许多报告现在还能找到。范老写文章，反对放空炮。他送给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不能坐下来读书的那些年青史学工作者一副对联。对联说：“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一句空话也不要写。搞历史，如果避开中国的史料，尽说些空话怎么行呢？尽管你引用了大段大段的语录，如果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那不过是空洞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毛主席的话。你要有史料，就得甘心情愿地坐十年冷板凳。当时，还有一种风气，不许学

生念书，一念书就说是走“白专道路”。周扬同志在一些讲话中曾提出“白专道路”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本来，“白”与“红”是政治上的概念、政治上的用语，如“白匪”、“白俄”、“白色恐怖”等等。怎么能把专家与这些概念相提并论呢？当然，我们提倡专家要又红又专，但他现在专了，只是红的不够，你就说他是“白”，就是反革命，怎么能这样说？所以说，周扬同志、范文澜同志、翦伯赞同志是真正有责任感的，就是要使史学界真正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当然周扬同志的话不光是对史学界讲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周扬同志这些讲话，编成“黑话集”。因为他反对提“白专”，所以说他的话是“黑话”。翦老在“文革”开始时挨批斗，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主要也是因为他提倡历史主义，反对“以论代史”。现在看来，他们当时的那种精神是很可贵的，那正是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最正确的史学方向。翦老被迫害致死，还有别的原因，说他解放前为刘少奇与蒋介石“挂勾”搭过桥。说句笑话，如果刘少奇真要与蒋介石“挂勾”，还用得着他翦伯赞去搭桥吗？

翦老的骨气、高风亮节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文革”前夕，江青、姚文元一伙发难，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老实说，我们这些人在当时想顶也没有顶住，不批不行呀！可翦老则不是，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刚才有人提到科学的良心，翦老就是有科学的良心。当然不能说我们这些人没有科学的良心，但我们在当时没有顶住，他确实顶得住，而他在精神上所遭受的折磨，我们则没法与他相比。不管极“左”思潮来自哪里，也不管它势头有多大，他总是抗得住。这一点尤其可贵，值得我们永远尊敬。

他是历史系的主任，他就先要把历史系办好。他是全国史学界的领导人物，他就想把全国史学界的方向道路问题、学风

问题掌握好。这是他的责任心。在培养人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解放以来，虽然也培养了不少又红又专的历史学者，出版了一些有水平的历史论著，但是，我们今天无论是哪方面的人才都还不够用。比如：有的地方新设立了大学，需要历史方面的师资，可真能胜任者不够用；现在提出整理古籍，真正能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才不够用；有的出版社聘请编辑，真正能胜任者不够用；编大百科全书，需要人写历史部分的辞条，能写的人也不够用。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过去“左”倾思想在起支配作用，总是说不要走白专道路，结果害了很多很多的人，尤其是现在的中、青年。当然在坐的学生不包括在内，现在没有人给你们戴“白专”的帽子，可五十年代我们的学生、六十年代我们的学生则不是如此。七十年代发展到极端，学生进校后，首先是批判“背着红口袋来装知识”，首先是批判这个。

今天，我们纪念翦老，首先要学习他那种倡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的精神；学习他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责任心，努力使全国史学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走上正确的轨道。这是我们应当继承发扬的，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于安息在九泉之下的翦老，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于我们的期望。

自序

翦伯赞先生是湖南省桃源县人，维吾尔族。生于1898年4月14日（夏历三月二十四日），逝世于1968年12月18日，终年70岁。他是一位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明年（1998年）4月14日，为翦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明年12月18日，为他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他的子女和孙辈、亲朋好友、同事与学生，以及一切关心他、热爱他的人们，都希望能在百年纪念之际，读到一本较详细系统地记述他的生平事迹的传记。我在翦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十余年，深受先生之惠泽，为他老写传，自是责无旁贷。

我为写传而进行准备的时间开始于1978年9月，那时翦先生的十年沉冤刚刚平反昭雪。准备工作是以收集资料为主。由于若干年来一直有较重的教学、编写教材及指导研究生等任务，而写传的准备工作的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十多年来共做了四方面工作：

1. 基本上通读了翦先生自1930—1966年间所发表或出版的全部论著，约有四百万字；并参加整理出版了其中的大部分。所出论文集有《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二、三辑，《史料与史学》增订本；专著有《先秦史》、《秦汉史》（即《中国史纲》第一、二两卷）、《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历史概要》，还有《翦伯赞遗诗》等。系统地阅读翦先生的全部论著，使我对翦先生